

代际团结潜在类别、矛盾情感和关系质量对代际双方身心健康的影响

杨晶晶, 郑涌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 通过对 121 对成年子女及其父母的成对数据进行代际团结的潜在类别分析, 以及使用对象-搭档互倚模型 (APIM) 进行多层线性建模, 考察了代际团结潜在类别、代际矛盾情感和关系质量对代际双方的幸福感、心理苦恼, 以及自评健康、主观寿命预期和主观余生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 代际关系中个体的代际团结类别和关系质量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个体的代际团结潜在类别会负向影响心理苦恼, 代际矛盾情感会正向影响心理苦恼; 代际矛盾情感会对个体的自评健康有消极影响, 而对方评价的关系质量会对个体的自评健康有积极影响, 同时, 个体自我评价的关系质量对主观寿命预期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代际团结; 代际矛盾情感; 关系质量; 余生时间; 父母

中图分类号: B848

Intergenerational Latent Solidarity Class, ambivalence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among Chinese

YANG Jingjing, ZHENG Yong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olidarity, ambivalence and qual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nd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irstly, latent class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data from Chinese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N = 121 dyads) shows that five latent solidarity classes emerged, then they were analyzed by actor-partner interaction models with ambivalence and quality. Results indicate that better latent solidarity class and better relationship quality are associated with both generations' higher well-being, and better latent solidarity class and lower ambivalence predict both generations' lower distress; lower ambivalence and partner's better relationship quality are associated with both generations' higher self-rated health, better relationship quality are associated with both generations' longer subjective life expectancy.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latent solidarity class; ambivalence; relationship quality; time left in life; parents

0 引言

代际关系, 指成年期亲子关系, 即, 成年子女和其中老年父母之间的关系。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加, 社交网络会逐渐缩小, 亲子关系会成为其社交网络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也会成为老人越来越希望依赖的一部分。根据 Carstensen 等 (1999) 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1], 老人随着体验到未来时间的有限性, 会转而寻求以获取情感为目的的目标, 其社交网络结构也会逐渐发生转变, 从年轻时扩大社交网络, 拓展人脉, 以获取知识方面等成功为目标而转向更关注谁能给老人自己提供情感满足的社交网络, 比如与自己成年子女的关系, 与老朋友的关系、与配偶的关系等等。其中, 与自己成年子女的关系备受代际关系研究领域, 以及健康心理学领域所关注, 因为代际关系对中老年父母的身心健康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代际关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博士点基金 (博导类) (20120182110001)

作者简介: 杨晶晶 (1985-), 女, 博士生, 主要研究人格与健康

通信联系人: 郑涌 (1967-), 男, 教授, 主要研究人格与健康. E-mail: zhengy@swu.edu.cn

系质量好会对中老年父母的自评健康、幸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代际关系质量不好则也会
45 对中老年父母的自评健康、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会产生抑郁、自杀等消极的心理或行为
结果。更有研究表明,代际关系中,团结冲突的潜在类别,以及关系质量,甚至会对代际双
方的自评健康、幸福感和心理苦恼产生显著的影响^[2]。因此,代际关系,是中老年人生活中
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研究工作者必须给予足够关注一个重要领域。现在随着人口结
构的失调,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更让中老年人能有一个可以安享的晚年,幸
福的晚年,代际关系的研究将会为实践者们提供一个有建设性的思路。

50 代际关系在国外是一个研究成果丰硕的领域,研究者们相继提出了两种代际关系理论:
代际团结-冲突理论和代际矛盾情感理论,并且有各自的研究范式。代际团结-冲突理论认为,
代际关系是以团结、凝聚力、亲密为核心,也会有关系紧张和冲突^[3]。代际团结-冲突范式
提出了一个相当具体且具有跨文化适用性的研究框架,同时也是其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代际
55 关系包含有包含联系性团结、情感性团结、一致性团结、功能性团结、规范性团结和结构性
团结。联系性团结是家庭成员所参与的各种类型活动的频率和互动模式;情感性团结是指对
家庭成员所持有的积极情感(如温暖、亲近、理解、信任、尊敬等)及其程度,以及对这些
情感的相互性体验;一致性团结则是家庭成员在价值观、态度和信仰上的一致性程度;功能性
60 团结指帮助和资源交换的程度(如经济上、躯体上、情感上的帮助);规范性团结即执行家
庭角色、承担家庭责任和履行家庭义务的承诺强度;结构性团结就是通过家庭成员数量、家
庭类型和家庭成员。后来,又补充上代际冲突维度,即代际间的关系紧张、不和谐与冲突等
不好的方面。代际矛盾情感理论认为代际关系的特点是矛盾情感,即中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
对对方或关系本身的态度矛盾或情感矛盾,即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共存,主要是指认知、感
情和动机中存在的主观而明显的矛盾^{[4][5]}。研究方法上有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种方式。直
65 接测量是直接询问代际关系中的双方或个体对对方或关系本身是否存在或充满矛盾情感;间
接测量则是通过分别测量代际关系中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再通过 Griffin 算法,计算出
代际矛盾情感的强度或大小,如果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间的差距越小,则计算出的矛盾情
感越强烈。本研究将同时考察代际团结各维度以及代际矛盾情感(直接测量)对代际关系中
的个体的健康是否存在影响。

70 自评健康,是对个体身体健康的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代际关系对中老年父母的健康也
有直接的影响。子女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老人向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对老年人的健康自我评
价没有影响作用;而代际间的情感交流能够改善老年人的健康自评状况。因此,促进老年人的
家庭和睦和代际交流,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心理福利和健康状况^[6]。国外研究发现,当父母
对代际关系报告高矛盾情感时,子女报告的健康状况更差;当成年子女报告对代际关系的高
75 矛盾情感时,老年父母报告的健康状况更差^[7]。本研究要考察,中国人的代际团结冲突和代
际矛盾情感对中老年父母的自评健康是否存在影响。

80 主观寿命预期,是对死亡率有很好的预测作用。而家庭关系的客观存在和有可以提供帮
助的某人会增加一个人预期寿命的长度。一项关于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拥有成年子女和健在
的父母会增加个体预期寿命的长度。但是,家庭中的年幼的子女并没有此效应^[8]。可见,成
年期亲子关系对父母的影响值得重视。本研究将考察代际团结冲突和代际矛盾情感是否会影
响中老年父母的主观寿命预期。

主观余生时间,即个体体验或觉察到的目前到生命终止的时间。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如果个体感知到还有未来生命时间很长,是开放性的,则知识相关的目标为优先选择;反之,
当未来生命时间觉知到是有限的,则情绪目标被认为是首要的。他们认为,生命中所剩余的

85 时间和实际年龄之间解不开的关系，确保了社会目标上的年龄相关的差异。时间觉知会受到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等的影响，是可塑的，并且当时间的约束出现时，年轻人和老人的社会目标都会发生改变。因此，他们认为时间觉知是人类动机完整的一部分。但本研究将初次试探主观余生时间是否会因代际关系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即代际团结潜在类别、矛盾情感和关系质量是否会影响个体的主观余生时间。

1 研究方法

90 1.1 被试和取样过程

本研究的被试选自 127 对成年子女和其中老年父母，他们在 2015 年 7 月份-9 月份接受问卷调查。这些被试在经过培训的问卷调查员的指导下完成了自我报告的纸笔问卷。每次调查均采用一对一的访谈模式，父母及其一个成年子女分别单独完成问卷，完成对彼此之间关系的评估。我们经过筛查，剔除了 6 对数据，因为他们有漏答 1 道或多道题目，所以我们视之为无效数据。因此，在以下的正式分析中包含了 121 对来自中老年父母及其成年子女的数据。

95 1.2 测量

代际团结 代际团结是使用由 Silverstein 和 Bengtson (1997) [3]提出的研究框架及其题项。七个维度：代际结构性团结、联系性团结、情感性团结、共识性团结、功能性团结、规范性团结和冲突，共有 10 道题目组成。居住的地理距离，大家庭聚会和小家庭聚会的频率，情感亲近性，意见的相似性，给予和收到帮助的频率，赡养父母和抚养成年子女的责任与义务，冲突的频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测量赡养父母和抚养成年子女的责任和义务的方法是同 Silverstein 和 Bengtson 使用的方法相似，不是直接询问对其自己父母或子女的责任或义务，而是对普遍意义上的认可。另外，冲突的题项选自 Clarke 等的研究[9]。这些题项被多个研究证实，有较好的实用性以及跨文化的适用性[2][3][10-13]。

代际矛盾情感 代际矛盾情感的测量使用的是直接测量方法，即直接询问被试“我对他/她（目标人物）感到有矛盾的情绪/情感。”答案从 1=从不，到 4=非常经常。

关系质量 测量关系质量是使用一道题目，选自前人的研究[12][14]。“总的来讲，你将如何描述你和你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之间的关系？”答案从 1=非常不好到 4=非常好。

110 **自评健康** 本研究使用的是一道自评题目，选自前人的研究[15][16]。“你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答案从 1=身体状况不好，到 4=非常健康。

主观寿命预期 主观余生时间 本研究使用 Ross 和 Mirowsky (2002) 研究中的题目，“你预期你能活到多少岁？”来测量个体的主观寿命预期[8]。主观余生时间则是用主观寿命预期-实际年龄。实际年龄则是要求被试填写自己的出生年月。

115 **个体人口统计学变量** 本研究还测量了被试的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从 1=月收入<1000 元，到 4=月收入>5000 元。受教育水平从 1=小学以下，到 4=硕士及以上。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见表 1。

1.3 数据处理

120 本研究依代际团结各指标将被试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同代际矛盾情感和关系质量一同进入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使用对象-搭档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action model, APIM）

[17]多层线性模型，是因为本研究中的数据是成年子女-父母一对一彼此进行评价的成对数据，是嵌套数据。本研究中，level-1 的变量包括结果变量、对内变量和混合变量，level-2 的变量有对间变量（见表 1）。变量潜在类别分析使用的是 Mplus 4.0^[18]，多层线性模型使用的是 HLM 6.08。代际双方的年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都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为了使截距更易解释，我们采用了对两个代际类别（成年子女、父母）和四种以性别来区分的代际关系（父子、父女、母子和母女关系）进行了效应编码，且除结果变量以外的其他的变量都采用了基于总平均数的中心化。

本研究使用 Mplus4.0 分析代际团结潜在类别，将题项的答案转换为三分类变量，根据 AIC, adjusted BIC, 和 BLRT 参数的 p 值，我们最终选定了 5 类别模型。从 2 类别模型到 6 类别模型的 AIC 值依次分别为：4188.009, 4094.208, 4069.192, 4061.680, 4066.537, adjusted BIC 值依次分别为 4201.093, 4113.993, 4095.679, 4094.868, 4106.427, BLRT 参数的 p 值依次分别为：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3333。因此 5 类别模型为最优模型。根据各代际类别的指标完成优劣（conditional probability>0.400），将此 5 类别进行排序，从优至劣重新编码为 5-1。

2 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 1 可见，本研究中的样本组成中，成年女儿及其母亲的成对样本占到了 62.4%，父子关系仅占到了 2.5%。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成年女儿和母亲的关系相比其他关系更为强健，最为持久的孝顺的关系^[19]，从而更倾向于表露关系。本研究对各个变量做了 Pearson 相关，其中相关从-0.014（主观余生时间和代际矛盾情感的 Pearson 相关）到 0.623（主观寿命预期和主观余生时间的 Pearson 相关），基本上相关的绝对值都在 0.105 到 0.424 之间属于中等程度相关，主观余生时间和主观寿命预期的相关较高（ $r=0.623, p<.001$ ），在后面的统计分析中，会分析其二者之间受到代际关系各变量影响的异同。

表 1 模型中 level-1 和 level-2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i>n</i>	<i>Mean</i>	<i>SD</i>	MINIMUM	MAXIMUM
Level-1					
自评健康	242	3.09	0.69	1.00	4.00
幸福感	242	25.57	4.59	11.00	31.00
心理苦恼	242	16.47	4.88	10.00	32.00
主观寿命预期					
主观余生时间	242	54.83	16.70	8.48	90.99
代际	242	0.00	1.00	-1.00	1.00
年龄	242	1.77	0.87	1.00	4.00
收入	242	1.62	0.79	1.00	4.00
受教育水平	242	3.02	1.14	1.00	4.00
关系质量	242	3.32	0.61	1.00	4.00
代团类别	242	3.21	1.13	1.00	5.00
矛盾情感	242	1.85	0.54	1.00	3.00
Level-2					
	<i>n</i>	%			
父女关系	71	29.3			

母女关系	151	62.4
父子关系	6	2.5
母子关系	14	5.8

145 **2.2 代际关系对代际双方自评幸福感、心理苦恼的影响**

结果发现（表 2），代际关系中个体的代际团结类别和关系质量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说明有更团结、更有凝聚力的代际关系类别，有更好的关系质量，则个体会较高的幸福感。同时可见，个体的代际团结潜在类别会负向影响心理苦恼，代际矛盾情感会正向影响心理苦恼；这说明，个体拥有更团结更有凝聚力的代际关系类别会减少其心理苦恼水平，而代际矛盾情感高的个体则其会有较高的心理苦恼。

150

表 2 成年子女和父母的代际团结潜在类别、矛盾情感和关系质量对代际双方自评幸福感和心理苦恼的影响通过对象-搭档互倚模型的分析结果

	幸福感			心理苦恼		
	<i>b</i>	<i>SE</i>	<i>t-ratio</i>	<i>b</i>	<i>SE</i>	<i>t-ratio</i>
父子关系	3.214	1.774	1.812	-3.079	0.053	-0.463
母子关系	-0.748	0.840	-0.891	1.000	0.906	1.103
父女关系	-1.225	1.247	-0.982	0.034	0.046	0.745
代际	0.026	0.357	0.074	1.652	1.346	1.227
A 代团类别	1.159	0.259	4.470	-0.690	0.288	-2.397
A 矛盾情感	-0.348	0.570	-0.610	2.484	0.629	3.951
A 关系质量	1.381	0.527	2.621	0.438	0.585	0.749
P 代团类别	0.056	0.259	0.215	0.466	0.288	1.618
P 矛盾情感	-0.265	0.570	-0.465	0.847	0.629	1.347
P 关系质量	0.562	0.527	1.066	-0.134	0.584	-0.229

注：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下表同。

155 **2.3 代际关系对代际双方自评身体健康、主观余生时间和主观寿命预期的影响**

结果表明（表 3），代际矛盾情感会对个体的自评健康有消极影响，而对方评价的关系质量会对个体的自评健康有积极影响。这就表明，若个体体验更强烈的代际矛盾情感，则对其自评健康有害，而代际关系中对方体验到关系质量更好，则会提高个体的自评健康水平。同时，个体自我评价的关系质量对主观寿命预期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表明认可代际关系质量好的个体会较长的主观寿命预期。本研究也对主观余生时间作为结果变量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个体的还是对方的代际团结潜在类别、矛盾情感，还是关系质量，都对主观余生时间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也说明，主观余生时间不是代际关系的结果变量。

160

表 3 成年子女和父母的代际团结潜在类别、矛盾情感和关系质量对代际双方自评健康、主观寿命预期和主观余生时间的影响通过对象-搭档互倚模型的分析结果

	自评健康			主观寿命预期			主观余生时间		
	<i>b</i>	<i>SE</i>	<i>t-ratio</i>	<i>b</i>	<i>SE</i>	<i>t-ratio</i>	<i>b</i>	<i>SE</i>	<i>t-ratio</i>
父子关系	0.229	0.222	1.030	10.259	4.565	2.247	10.998	4.583	2.399
母子关系	-0.207	0.105	-1.966	-5.172	2.160	-2.394	-5.187	2.169	-2.391
父女关系	0.059	0.156	0.376	0.760	0.677	1.122	0.590	3.222	0.183
代际	-0.064	0.069	-0.925	1.711	0.950	1.801	-6.500	1.270	-5.116

A 代团类别	0.020	0.041	0.479	0.760	0.677	1.122	1.472	0.791	1.861
A 矛盾情感	-0.241	0.087	-2.783	-0.815	1.485	-0.549	-2.072	1.679	-1.234
A 关系质量	0.027	0.084	0.316	2.830	1.377	2.055	1.971	1.605	1.288
P 代团类别	-0.057	0.041	-1.369	-0.167	0.677	-0.246	-0.242	0.791	-0.305
P 矛盾情感	-0.031	0.087	-0.362	-0.990	1.485	-0.667	-0.366	1.679	-0.218
P 关系质量	0.159	0.083	1.896	1.379	1.377	1.002	1.553	1.605	0.968

165 3 讨论

本研究中使用了三分类变量的潜在类别分析,使各个类别在各个代际团结指标上的表现更为详细,更有助于研究者把握和了解各个潜在类别的特点和优劣。但是本研究对成年子女及其父母的代际团结潜在类别的分类结果与我们之前所做二类别变量的研究结果一致^[2],依然是五个潜在类别,说明代际团结理论框架及其研究范式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可以在未来应用在跨时间维度的纵向研究中。

代际团结潜在类别、代际矛盾情感和关系质量对代际双方的自评健康、幸福感和心理苦恼都有显著影响。可见代际关系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对个体具有保护性的作用。而在之前的研究中个体自我或对方的代际团结潜在类别、关系质量都对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这之间的差别,可能是因为在本研究中的模型中加入了代际矛盾情感这个变量,从而影响了其他变量的显著性。而关于代际矛盾情感和代际团结潜在类别与关系质量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主观余生时间和主观寿命预期之间具有高相关。但是主观寿命预期受到代际关系的影响,即代际关系可以调节到个体的主观寿命预期,较好的关系质量就可以积极影响个体的主观寿命预期长度。但是主观余生时间并没有受到个体以及对方的代际关系的评价所影响。主观寿命预期是重要的身体健康的指标,与死亡率有极其显著的相关。但主观余生时间的性质并未完全了解清楚,它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以及会影响到个体哪些身心状况,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Carstensen L L, Isaacowitz D M, Charles S T.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9, 54: 165-181.
- [2] 杨晶晶, Ariela LOWENSTEIN, Todd JACKSON, 郑涌. 代际团结潜在类别与关系质量对自评健康及幸福感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13, 45: 811-824.
- [3] Silverstein M, Bengtson V L.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 429-460.
- [4] Pillemer K, Suitor J J, Mock S E, Sabir M, Pardo T, Sechrist J. Capturing the complex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Exploring ambivalence within later-life families[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7, 63: 775-791.
- [5] Suitor J J, Gilligan M, Pillemer K.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in later life[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 66: 769-781.
- [6] 宋璐, 李树茁, 张文娟.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6, 26: 1453-1455.
- [7] Fingerma K L, Pitzer L, Lefkowitz E S, Birditt K S, Mroczek D.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qualities between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ell-being of both parties[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2008, 63: 362-371.
- [8] Ross C E, Mirowsky J. Family relationships,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life expectancy[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002, 43: 469-489.
- [9] Clarke E J, Preston M, Raksin J, Bengtson V L. Types of conflicts and tensions between older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J]. *The Gerontologist*, 1999, 39: 261-270.
- [10] Lowenstein A. Solidarity-conflict and ambivalence: Testing two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d their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for older family members[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2007, 62: S100-S107.
- [11] Lowenstein A, Daatland S O. Filial norms and family support in a comparative cross-national context: Evidence from the OASIS study[J]. *Ageing and Society*, 2006, 26: 203-223.
- [12] van Gaalen R I, Dykstra P A. Solidarity and conflict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parents: A latent class

- analysi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6, 68: 947-960.
- 210 [13] Yi C, Lin J. Types of relations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elderly parents in Taiwan: Mechanisms accounting for various relational typ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009, 40: 305-324.
- [14] van Gaalen R I, Dykstra P A, Komter A E. Where is the exit?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high contact ties[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09, 24: 105-114.
- [15] Antonucci T C, Ajrouchb K J, Janevic M R. The effect of social relations with children on the education-health link in men and women aged 40 and over[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3, 56: 949-960.
- 215 [16] Newsom, J. T., Rook, K. S., Nishishiba, M., Sorkin, D. H., & Mahan T L.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 exchanges: Examining specific domains and appraisals[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2005, 60: P304-P312.
- [17] Campbell L, Kashy D A. Estimating actor, partner,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for dyadic data using PROC MIXED and HLM: A user-friendly guide[J].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2, 9: 327-342.
- 220 [18] Muthén L K, Muthén B O. *Mplus user's guide* (5th ed.). Los Angeles, CA: Muthén & Muthén, 1998-2007.
- [19] Fingerman K L. Sources of tension in the aging mother and adult daughter relationship[J].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6, 11: 591-606.